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

李宪生 著

两次世纪之交的百余年，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变化剧烈，但世界经济从商品化到市场化演变及一体化趋势不可抗拒，成为一条历史主线贯穿其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历了两次对外开放，虽然两次世纪之交的两次对外开放呈现出诸多差异，但顺昌逆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武汉作为内陆中心城市，其对外开放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百余年来武汉之对外开放无疑是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两次对外开放相隔百年，跨越两个不同的时代，在开放的客观环境、主观动因、开放效应都大相径庭，但透过历史的表象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比较研究历史启示在于，在现代条件下，开放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则发展，早开放则早发展，大开放则大发展。因此，研究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百余年对外开放史，对全面应对“入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可持续发展将不无裨益。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两次世纪之交 武汉的对外开放

李宪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李宪生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ISBN 7-5073-0980-0

I.两… II.李… III.对外开放-研究-武汉市
IV.F127.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432 号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

著 者/李宪生

责任编辑/王春明 武志军

封面设计/赵 虹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湖北省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8 印张 15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5073-0980-0/C·89 定价:20.0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十堰市圖書館藏

書文生

二〇〇二年

三月廿六日

序 言

章开沅

我历来认为,历史学者应该关心社会,关心人类,把自己定位为把过去、现在、未来联接起来的桥梁。90年代初,本所有几位博士研究生相继转业从政、经商,我又鼓励他们把研究历史与创造历史结合起来,用做学问的功夫营造社会的事业,同时又用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增进自己的学问。去年秋天,我在近代史研究所50周年所庆的集会上,亦曾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讲话,强调历史学者应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既参与历史又参与现实,特别是要用自己的史学成果,即经过自己体验和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大众一起追求更加光明幸福的未来。《光明日报》记者曾为此发表了访谈录,并且引起一些同行学者的积极回应。

无独有偶。最近我收到台湾好友张朋园教授寄来的贺片,内页印有我非常熟悉的位于南港的近代史研究所主楼的照片,下面则是赫然在目的两行文字:“我们研究历史 我们创造历史。”真是不谋而合,所见略同!

尘封的历史需要揭开新页,备受冷遇的史学应该显示自己的价值,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出更多的光

和热。回想过去,我们中国的史学祖师爷,把自己的学问定位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慨,何等抱负!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史部位居第二,仅次于神圣的经部,而有些前辈学者甚至标榜“六经皆史”。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也极为重视史学,他们明确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认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历史学家的技艺》)所以他把从事史学看作自己的“天职”与“使命”,并且为进步史学与反法西斯斗争奉献出生命。他的同行与战友费弗尔也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让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样掷地有声的史学大家话语还可以举出更多更多,所以我经常提醒暂时陷于困惑的同行:“不要单纯埋怨社会不关心史学,而首先要自问史学是否关心社会。要想让社会理解史学的价值,首先我们自己要真正理解史学的价值。”

本书作者大学时代专攻哲学,以后多年从政,有各个层次与多种部门的工作历练,是即能实干又有头脑的新一代公职人员。他在政事余暇颇思从历史寻求更多的睿识真知,因而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因为他当时还在武汉市与武汉经济开发区担任领导工作,我在其学习之始便赠以拙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借用传主的一句名言给以勉励:“天之生人也,与草

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与孙中山所说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原来是一个意思，但涵盖面似乎更宽，也更有感染力。此书遂成为作者的经常读物，张謇也就成为他学习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常向我谈及读后心得，立志像张謇那样，为本地区的开放与改革切切实实办成几件大事，造福民众，泽惠后世。

经过一段刻苦的博士课程学习以后，作者决定以《两个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经指导组集体研究后，我们通过了他的开题报告，因为这正好与我通过现代化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的思想相近相通。

上个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的历史主角自然是张之洞。对张之洞的研究前人成果已多。仅以前些年本宋亚平提交的学位论文《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而言，即已从发展目标与宏观调探的角度，阐发了张之洞一系列与传统相离异的新思路，如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政”思想；以工业为中心，以工促农、以工促商的“工政”思想；轻工业和重工业并举，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结合等等。而宪生这篇篇文则着重抓住武汉对外开放这个主题，从全局上来论述张之洞的开放观，如对武汉比较优势的体认，相关各项开放举措，以及开放对武汉近代化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与见解。

这篇论文不同于既往张之洞研究论著之处有二：一是仅仅把张之洞主导的上个世纪之交的湖北(武汉)

开放作为参照系；一是更为着重对两个世纪之交武汉开放加以比较，并且寻求现今武汉开放大格局的战略思想。所以作者重新审视了武汉新一轮开放的历史过程，包括开放进程的长期中断，80年代传统城市功能的复兴，以及接踵而至的对外开放与城市体系创新。论文作者既有广阔视野，也有理论的功力，对“迟发展效应”（或称“后起优势效应”）、两次开放的区位环境比较、武汉人文心态演变及其对开放的影响，均有较深刻的新见。作者也并未局限于经济层面的探讨，我很欣赏这篇论文的结语：“学习西方并赶超西方，光有科技发明家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思想家、人文学家。这就向我们现行教育体制提出挑战，要求做到技术教育与人文品质教育的有机统一，而且在二者之间更侧重人文教育，着力于培养社会成员的民族尊严意识和更为开放、开阔的文化创造意识。唯其如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才能是本质的而非表层的，全面的而非部分的，平等的而非卑微的，文化的而非仅仅是经济的融入国际社会并自立世界之林。”这番话不是纸面文字，而是作者主持武汉经济开发区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和许许多多热爱武汉这方热土地的干部与民众一样，都正在以热情而扎实的工作力图重圆百年前的“东方芝加哥”之梦，以武汉腾飞支撑湖北腾飞和整个中国的腾飞。

正当篇论文行将完成之际，作者由于湖北省工作需要忽被调任十堰市的领导工作。从号称湖北开放窗口的先进经济开发区，转移到全省两大贫困地区之一

的十堰市,工作环境的反差之悬殊可想而知。但宪生毅然承担重任,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以如同对武汉那样的热爱与投入,立志与十堰市的干部与人民共同奋斗,抓住西部开发的大好机遇,加速开放改革的步伐,尽快改变封闭、贫穷、落后的面貌。让老百姓都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这是每一个真正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地方官员的共同心愿。但要想把这种心愿变成工作实绩,光靠废寝忘食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必须动脑筋、想办法,而对于主要领导人来说,尤其需要做学问的功夫来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的做的。到十堰市不过一年多时间,他与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成员,在深入调查研究市情的基础上,审时度势,跳出十堰看堰,把十堰的发展纳入整个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大格局下加以重新审势和定位,把十堰认定为中西结合部的重要枢纽,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西部开发战略支点,构建“丫”型“经济走廊”,建立“秦巴经济联合体”以及“东引西联、项目兴市、优化环境、加快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构想。现在,他就十堰参与西部大开发的若干重大问题历次所作汇报发言或讲话,以及在有关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集纳成册并将出版,书名为《在东引西联中构建秦巴大市场——十堰市参与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研究》。我把此书看作《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的姐妹篇,也是宪生在工作中抓紧研究、并以研究促进工作的继续。与武汉经济开发区一样,以宪生为首的十堰领导干部的战略构想已经转化为积极实践,转化为整个地区和人民的行动指南,若

千重大项目业已启动,全市参与西部大开发的配套工作高潮迭起,并且以扎扎实实的步伐不断前进。去年,我于5月、8月先后两次前往十堰,既考察了市区,也参观了农村,十堰的变化,虽不能说是日新月异,但已说得上是旧貌开始换新颜。更为可喜的是干部与民众心态的变化,人民萌发新的希望,社会孕育蓬勃生机。十堰正在前进,十堰必将崛起!

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却认为“等米下锅的决不是巧妇”。既然称作巧妇,就必然会千方百计谋求生路,就迟早会有米下锅,乃至满囤满仓。宪生在条件优越的武汉经济开发区的优异政绩固然可贵,但我更重视也更充满期待的却是他在十堰这样贫困地区的艰苦开局。10年以前,我曾到达十堰贫困的山区,那里有些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低下使我揪心,其情其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去年春节,宪生没有与家人团聚,是在贫困地区与贫苦人家共度岁的。我想只要心里经常装着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至今尚未能完全免于饥寒的贫困老百姓,这样的地方官就必然会造福于一方,泽惠于后世。

“我们研究历史,我们创造历史。”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仿佛又听见海峡彼岸传来的恳挚呼声。我把它看作是史学家共同的心声,也以此作为对于宪生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的勗勉!

辛己新春于桂子山实斋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19~20 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 (18)

(一)从开埠到张之洞督鄂 (18)

(二)取开放之策 兴开放之风——张之洞的开 放观 (36)

(三)张之洞对武汉比较优势的体认 (59)

(四)张之洞的对外开放举措 (65)

(五)开放与武汉城市近代化 (97)

第三章 武汉新一轮对外开放透视 (116)

(一)开放进程的中断..... (117)

(二)对内开放:传统城市功能的复兴	(127)
(三)“以开放为先导”与现代城市体系的创新	(139)
(四)重温“东方芝加哥”之梦.....	(158)
第四章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	(175)
(一)对外开放的滞后与“迟发展效应”.....	(176)
(二)江山依旧在 优势各不同 ——两次对外开放的区位环境比较.....	(196)
(三)从“码头文化”到“内陆意识”:百年武汉 人文心态的演变及其对开放的影响.....	(206)
第五章 结 语	(217)
附录:参考文献举要	(239)
后记	(247)

第一章 导 论

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已翩然而至,这对正寻求快速发展的武汉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契机。武汉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对外开放状态。上次世纪之交,武汉后来居上,由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一举成为全国颇具盛名的重要口岸。这次世纪之交能否再创辉煌,一跃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以史为镜,总结、比较、借鉴,将不无裨益。

开放是一个与封闭相对应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外部世界互为沟通、交往以求得某种内外平衡的状态和过程。对外开放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外经济开放,它是各方面对外开放的基础。所谓对外经济开放,是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视为一个开放系统,作为世界经济运动的一个部分,鼓励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达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本国经济的高效发展。但是,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开放,仅有经济上的开放是不全面的、残缺的开放。它还应该是文化学和历

史学意义上的开放。开放的核心是不同文化类型间的相互交流与渗透,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范围内世界先进主流强势文化向落后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是各国通过开放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并对本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调适,使先进的工业文明最终战胜落后的农业文明,而使社会文明整体而非局部的全面转型。

对外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商品经济及对外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史籍记载,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周成王五年间,南方有个叫越裳氏的国家,曾派使者携带大量物品前来我国进行贸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起渤海南至广东的交通线已经开辟,同邻近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有着海上交往,并能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直航印度和锡兰。公元前 425 年至 375 年间,巴比伦人曾从爱琴海到达我国南海一带进行贸易。希腊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奥尼斯科利道斯在其《沿岸航行记》一书中提到:公元前 4 世纪“西方诸国所用之丝与铁,皆从中国输来”。在公元前 221 年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朝也十分重视对外国的交往和贸易联系,专门设置了掌管对外事务官员,叫“典客”,属于三公九卿之列,地位很高。然而我国古代贸易有较大较快发展的却是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随着张骞开创商路的畅通,

我国享有盛誉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各国,“丝绸之路”为欧亚两大洲贸易开辟了一条通途。由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中国丝绸自古以来始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而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西方商品,对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时代。唐代不仅陆路贸易繁荣,而且海上贸易也日益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同时还促成了唐代三大海上贸易港口即广州港、潮州港、扬州港的繁荣。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在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了壮丽的篇章。郑和历尽艰辛,先后到过 30 多个国家,最远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口。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为后人哥伦布、麦哲伦所不能及。然而所有这些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

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开放的世界经济客观要求基础上的。当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国际分工。两次世纪之交的开放基本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发生和不断发展。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产品已不能为国内市场所容纳,所需要的原料也非国内供应所能满足,必须到国外去寻求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粮食来源。这样就把世界各发达国家

和许多落后国家卷入到国际商品交换中,使原来在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换把各国不同的生产转化成世界总生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当时,联结各国经济的纽带是国际贸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是又出现了联结各国经济的新纽带——国际资本运动。此时的国际资本运动主要发生在制造业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以农矿业为主的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二次大战以后,除了原来的制造业与农矿业的垂直分工和工业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外,国际分工又深入到工业部门内部,出现了同一工业部门不同的产品、零部件和工序的分工。在此基础上,资本国际化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国际化之外,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也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东西方对峙局面的结束,使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

态之争相对淡化,发展成为世界主导性潮流,各国充分认识到,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世界市场上新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①。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表现:首先,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别国的资源,要么是技术、资金,要么是原材料、劳动力,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渗透性越来越强。其次,当代世界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成为主要生产要素,知识和技术成为主要生产投入。因此各国纷纷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第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大内在驱动力量。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市场国内化表现得相当充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全球自由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量占全世界贸易量的90%,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其三大职能之一就是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宗旨,组织全球谈判,也就是开放

^① 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